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魏源



一、少习经史，以诗文“名满京师”

公元1794年4月23日，湘西某地一位年轻妇女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儿子。看着孩子娇嫩的面庞，回想起前一天晚上的那场梦，她不禁哑然失笑：对孩子的出生，自己早该有所准备的，梦中那位老人手持巨笔和金色花朵向自己走来，不正预示着这个小生命的降临吗？

孩子降生的这个家庭在当地是颇有些名望的，曾祖父魏大公是国子监生，年轻时曾因代全郡交纳了1年的饷银而闻名远近。当时的县令卢大经为此赐赠的匾额至今还悬挂在门口，上面“邵邑醇良”4个字还在向人们叙述着那段不同凡响的往事。祖父魏志顺虽然终身隐居，未曾做官，但先辈乐善好施的品德并没有在他身上消失。大约在魏源10岁左右，祖父也曾有过如同曾祖父那样的善举。那一年，邵阳一带遭遇饥谨，老百姓嗷嗷待哺，但县令催促赋银的急迫较往年有增无减。眼看着民情汹汹，一触即发，魏志顺又一次慷慨解囊，倾全家资财代全县乡亲交纳饷银，平息了一场事端。但是，祖父时的家境与曾祖父时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次壮举虽赢得了乡里称誉，却致成家道中衰。从此后，这个家庭就只能在贫寒中挣扎了。到了父亲魏邦鲁的手里，家境已难有改观。那时，父亲在江苏作着一个小官，收入微薄。家中祖母虽然尚在人世，但年老瘫痪，起居饮食都要人侍奉。实际上，全家老小只有靠母亲昼夜纺织勉强糊口。我们的主人公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渡过的。

7岁的时候，也就是在祖父代输全县饷银的前几年，魏源的家庭还算得上富裕，家中也有自己专门的家塾，作为塾师的伯父魏辅邦更是当地有名的严师鸿儒。那一年，魏源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伯父的教学的确很严厉，史载他“课子侄及孙辈甚严，必延访名师，不惜重聘，礼貌特隆。每日除塾师功课外，口讲指画，彻夜不休。”但是，严格的教育虽有些不近情理，却也使魏源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学习的习惯。他常常独居一室，彻夜吟诵，通宵达旦。母亲见他过分勤苦，每当入夜，便强令他熄灯上床。魏源则待其母熟睡后，偷偷地掩被挑灯，攻读不已。久而久之，终于被母亲发现了。她先是晓之以理，继则以泪相劝，这才使魏源稍不注意。

由于魏源一向学习刻苦，9岁时到邵阳县城参加童生考试，便一鸣惊人。当时考试的形式是唱名应对，即先由主持考试的县令题出上联，再由考生对出下联，要求越快越好。轮到魏源时，县令指着一个茶杯中的《太极图》题道：“杯中含太极”，魏源应声答对：“腹内孕乾坤。”这一应对既合辙押韵，又展现了他的豪情壮志，令县令和在场的人大为惊异。

应童子试后不久，家庭破落，魏源和母亲过着“夜则燃豆秸，母绩子读，欣欣忘贫”的清苦生活。到14岁时，魏源征得父母的同意，有机会第一次离家外出，到了父亲的江苏任所。这次出行，使他了解到了书本上读不到的很多知识。尤其令他震撼的是东南海防吃紧，盐政腐败，军饷短缺，情况十分危急。与此同时，他还耳闻到北方白莲教起义的浩大声势和给清朝统治造成的严重打击。这一切，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嘉庆十三年（1808年），魏源参加邵阳县试，一举考中秀才，从此开始究心于陆象山、王阳明等人的宋明理学，并对历史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两年以后，在邵阳县的秀才岁考中，魏源获得优异成绩，并取得“禀生”资格。之后，他在家乡设馆授徒，“名闻益广，学徒接踵”，时仅18岁。在此期间，他边授学徒，边潜心孔孟，先后著成《孔子年表》、《孟子年表》、

《孟子年表考》及大量诗文。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出，魏源此时的心情十分烦闷。在《秋兴三章》中，他这样写道：“出仰昊空，昊空寥落；入对孤灯，古人如昨。萧萧草虫，烈烈其音；岁暮何为，只搅我心。”一派凄凉寂寞的失落情怀。

1813年是魏源的又一个人生转折点。那年，他在本省学政的选优考试中被录为“拔贡”，获得了朝考资格。翌年，魏源随父亲及友人北上进京。

从长沙到北京，一路上，魏源亲眼目睹了北方地区灾患频仍、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他看到，由于河水泛滥，“当年歌舞馆，下隔黄泉百；当年龙战垒，上有河声涛（huò 波涛冲击声）”。老百姓眼看着“春风吹麦新”，却依然“冽冷并不食，寥寥突无烟”。于是“明知麦花毒”，也只好饥不择食，结果尸骨遍野，聚土成坟。对此，他以怜悯的心情希望老百姓来年“勿食荞麦花，复作坑中人”，但他不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次北行，游览名胜、凭吊古人也占去了他的很多时间。站在太行山下，他举目眺望巍巍山峦，心潮犹五岳起伏，难以自抑。他似乎看到了信陵君会师函谷的壮阔场面，听到了岳飞攻克朱仙镇的热烈欢呼。但他又为信陵君会师函谷之时忽然被召而惋惜，更为岳飞大捷朱仙镇、攻败垂成而抱憾。为此，他悲愤地高呼：“何不借风雷，以壮天地颜？”

到京以后，魏源被当年主持邵阳秀才岁考的学政李宗翰“延馆私邸”，成了他的家庭教师。此时，他一边任教，一边在课余闲暇追随京师大儒胡承珙治汉学，究《诗》义，并就《公羊》大义就教于当时名儒刘逢禄，受其今文经学的影响很深。在从胡、刘二人学习经学的同时，魏源广泛结交，林则徐、龚自珍等人便是在此期间结识的。他们常常聚会一处，谈古论今，抨击时政，研讨学问，互相间引为知己。其时，在京城喧嚣一时的宣南诗社对魏源也很有影响。1814年冬，翰林院编修董国华约集同仁组织消寒诗社，大约每10天集会一次，每次集会必有诗作。参加这个诗社的大都是京城中名流人物。诗会始则作诗狂饮，后来纵论古今，议题渐趋广泛，成了这些名官僚、名学者间交流思想、抒情发愤的场所。诗社名声日隆之后，圈内圈外又有人根据参加者多住在宣武门以南的特点称其为宣南诗社、城南吟社等。魏源为晚辈，他的老师胡承珙及好友林则徐等都是诗社的经常参加者。魏源虽然没有正式地列名诗社，但也常随胡承珙参与其中。这段友情对他日后活跃于上下名士之间很有助益。

在北京期间，魏源刻苦攻读，勤奋于书案，有人记载他“入都后，治学甚殷，陋室敝袍，借书还书之车，时喧于室。”诗集《北道集》就是这时写成的。而正是这本诗集，也为他赢得了能文善诗的美名，一时间竟“名满京师”。有人读过诗集后，题诗记曰：“君今甫二十，出语如有神”；“把君《北道集》，怀抱生古春。”有一侍郎见此诗作后，念其“敦雅”，“四出揄扬，数日名满京师，中朝公卿争纳交焉”。而在大量写作的实践中，魏源对作诗也有了一些体会。他在给一位好友的诗稿题跋时，集中阐发了他的认识。他认为作诗贵在“厚”、“真”、“重”三点。厚指深厚的生活积蓄，即所谓“博观约取，厚积薄发”，也就是积累众多素材，从中剪裁，以筛取典型资料。“真”指诗作要有真情实感，“凡诗之作，必其情迫于不得已，景触于无心，而诗乃随之。”也就是有情则书，有感则发，不要无病呻吟。“重”指诗作要有内容、有蕴意，显得厚重，最好能使人有所感、有所悟。只要能做到这三点，其他所谓“人之知与不知，后世之传与不传”，都不必

介意。

总之，魏源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广泛涉猎了文学、历史等各个方面，特别对历史上先秦诸子的研究更为用功。这些都为他以后认识、研究现实的政治、经济等社会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入门纷书册，出门耽水石”

居京三载，魏源无论在学问还是交结方面均获益甚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心绪方面同样春风得意。相反，屡试不中的打击困扰着他，他感到愤懑，感到无奈。1816年冬，随着父亲魏邦鲁调任江苏嘉定诸翟巡检，魏源随父南下，开始了“入门纷书册，出门耽水石”的游历、深思的人生历程。

在这期间，他不断往来于北京与湖南之间，尽游沿途名胜。特别是1819年至1821年间的长途旅行，更使他在感佩祖国山水之美的同时，对国情民情了解更深。这次游历，大致的路线是北京——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江苏——北京——山东——北京。他出北京，入山西，继游嵩山、华山，入潼关，过子午关，南下直抵成都。在成都与旧友相会之后，又自嘉陵江乘船出蜀，回到湖南。在从湖南去江苏的路上，途经洞庭湖，沿长江东去，游览了君山、汉口、黄鹤楼、小孤山、燕子矶，于1821年重回北京，二游泰山。

记载这次出游的是他的大约七八十首诗作。

这些诗首先描绘了祖国如画般的多娇江山。如写湘山“近水山例青，湘山青独活。无云翠濛濛，烟村尽如泼”，给人以“全身浸绿云，清峰慰吾渴”的奇意美感；写剑阁“石石欲刺天，石石怒争壁。不见一鸟飞，但闻万马慄”，使人如身临其境，仿佛正独自攀缘于悬崖峻峭之间，强烈地表现出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浏览魏源的山水诗，其中那雄伟豪迈的气魄更能震人肺腑。他写华山之高，说“行到云端未是尊，直穷空际始无垠”，由此激起了诗人的浪漫幻情，下决心“被发骑麟瞰大荒，我与元气谁久长”，要与华山一比高下了！在作诗的手法上，有罗曼谛克的幻想，如“青壁降我前，丹崖枕我席；瀑雪想我左，松云滃我腋。溪声以为楼，溪光以为宅”；“我欲仰空书大乘，以岱为笔天为缙。劫火不侵雨不淋，空中说与诸天听”；有新奇的比喻：“如山侧竖莲倒开，鳞甲怒作之而颀。成阵万象如潮来，门庭楼阁堂庑陔”；有铺张的排比，如“天空日堕城乌集，城头接江江水立。银龙翻江截江入，万水争飞一江急。小舟劈入潮头行，两岸倒走千山倾。梢上使船一纸轻，但以手语无人声”；更有令人扼笑不止的夸张，如“月兮月兮劝汝一杯酒，安得广寒宫里一携手。月中仙人笑回头，视如大地同一浮。汝言桂树修玉斧，谁知大地河山影万古；汝言三五有盈缺，谁知四大海水如圆玦（jué古时佩带的半圆形玉器）”。

当然，魏源写诗，不只是尽情沉耽于秀水奇石之间，更多的则是寄情感、讽喻于诗篇。其中孕藏了作者的好恶情怀和思想观点。

在山水诗中谈史说佛，是魏源诗作的一大特点。他登上锦城，举目四望，历朝角斗逐鹿的战火风云犹如历历在目：“登锦城，望寥阔，屡朝龙战争蜗角。”他爬上泰山，站在经石峪下，望着字大如斗、雄逸高古的隶书《金刚般若经》，马上联想到它与徂徕山水牛洞、邹县冈山的《文殊般若经》同出北齐僧人安道一之手。于是，诗人“慨六朝如此墨王，而世莫知名，但知有羲之姿媚之书”，为给历史以公正，他便“爰歌以纪之”，《岱山经石峪歌》这首充斥着佛光禅玄的诗作就这样诞生了。寄托诗人对世道艰难、人情诡譎的哀怨之情，是魏源诗作的又一特点。他借高山以喻人生，说“天险尚可升，地险尚可平，险莫险于行人情”；借风云变幻以喻人生死无常：“今日之今，风风雨雨。俄焉矚之，已化为古。”于是，他企图借大自然的飞云流彩来浇

灭心中的人间积愤：“听君歌，歌以哀，饮君流霞之酒杯，浇君胸中之崔嵬。”大有超脱于尘世之外的渴望与自迷：“人间局促不可游，不如乘云遨翔九州。”

魏源的诗作时而豪放飘逸，时而深沉激跃，时而辛辣尖刻，映衬出诗人知识宏富、多愁善感的个性特征。的确，他一生刻苦追寻唐宋大家的脚印，顶礼膜拜于李杜韩白的神堂奥舍，孜孜不倦。他对自己的诗作也颇为自负，曾自诩道：“成都美酒醉千春，狂呼杜陵李白为宾主。”但是，无论如何，魏源的诗作有着它显而易见的缺憾。他的语言缺少锤炼，少有韵辙之美，遣词造句也缺乏形象与生动。特别是在诗中说佛谈玄，更严重影响了诗歌的艺术性和感染力。这些方面。他与李白、杜甫的精雕细刻有着天壤之别。

“入门纷书册，出门耽水石”。沉浸在大自然美景之中的魏源，以诗歌为武器，尽情地抒发着内心深处的兴奋、欢乐、忧伤、悲哀与惆怅。但是，当他步入书屋的时候，则完全以一种谦恭、谨慎、认真、踏实的姿态，辛勤耕耘于经史子集和鸿儒硕学之间，俨然一位博文强记的恂恂学者。从1817年到1823年，他先后注释、发微、题跋的书籍有《曾子注》、《大学古本》、《老子本义》、《孝经集传》、《论语孟子类编》、《子思子章句》、《曾子章句》、《公羊春秋古微》、《书古微》、《诗古微》等10余部，并写出过20多篇论文。在这些浩大宏富的著作中，魏源对先秦诸子及后代大儒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他指斥《孟子》的问答“问其所不必问，答其所不必答”，认为孟子的言论“支离不可思议”，他所教养出来的门徒也全是一些不堪闻问、追逐名利、阿谀奉承之徒。这些人“不知所学何道，所为何事”。在《大学古本·序》中，魏源对朱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骂他不学无术，“未悟古本分章之条理，而误分经传，加以移补”。对陆、王心学，他也作了尖锐的批评，斥责王阳明“变圣学为异学”，“启末流之弊”。

评讥时贤，在魏源的著作中也所见不少。龚自珍曾经提出过一个具体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它主张在全国农村建立一种按血缘关系组成的经济结构，即按宗法关系占有土地并组织农业生产。该组织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可分为“大宗”、“余夫”和“闲民”三等。其中前二者属于剥削阶级，闲民则是雇农，属被压迫对象。显然，龚自珍的这个“农宗”论是逆历史潮流的。魏源在评价它时，认为它是“古今所未发”，但又说“若在国家初造之年，则法亦易行”，实际上是委婉地否定了它在当时情况下有付之实施的可能。这说明即使在早年，魏源也有较龚自珍更为进步的方面。在其他篇目之后，魏源也多有按语，或赞扬或抑揄，不一而足，并非一味阿谀。这方面的又一个例子是他对穆彰阿的冷漠无情。魏源很早就以诗文“名满京师”，加之他攻史研经，学识渊博，在京城内是很有些名气的。1816年，曾有人把他举荐给当朝炙手可热的权臣穆彰阿，穆则赞美其才，欲为所用，竟屈尊到魏源寓所造访。但是，魏源鄙其为人，对穆彰阿显得傲慢、冷淡，使穆的目的难以达到。

魏源的学问，在当时不只是闻名于熟人圈中，一般人对他也多有所知。京城中一度就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记不清，问默深（魏源的字）；记不全，问魏源。”

然而，赞誉归赞誉，封建时代文人们获得成功的标志却只是科举场上是否取得了功名。在这方面，魏源的运气又偏偏坏得出奇。29岁的时候，他又一次步入乡试的考场。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省一级的考试了。前两次，他只考中了副榜。也许是多次临考、经验丰富的缘故吧，这一次他以顺天府乡

试第二名的成绩考取，终于成了一名堂堂举人。

三、入幕贺长龄

大概是反复出入考场的原因，中举的魏源似乎并未显出应有的兴奋。这以后，他的人生轨迹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读书、交友、考察、访问，过着失意文人的生活。

旧时的官场，士子们埋头读书，为的是有一天能够赐官受爵，飞黄腾达。但斗转星移，成功者毕竟只是少数。于是，官场中衍生出一种达官显贵收罗落魄文人的幕府制度。通过这种制度，文人们抚慰了自己学以入仕的渴望，官员们博得了爱才惜才的美名，双方各得其愿。多次科举不中而又已过而立之年的魏源，此时也不得不走上了投入帐下的世俗之路。他的主子是他的同乡、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

魏源与贺长龄相识还是 1814 年的事情。那一年，魏源 20 岁，贺长龄 29 岁。那以后，同乡和同龄人的双重缘分使他们交往越来越多，关系也日见深笃。贺长龄由于中进士较早，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相比之下，魏源则辛酸坎坷，心中充满了愤懑。时过 12 年之久，贺长龄已是官场中的后起之秀，而魏源却依然到处游荡。眼看着这位老乡怀才不遇，自己却手下乏人，贺长龄将魏源请到了自己的帐下。从 1825 年到 1827 年，贺长龄主持江苏财赋之事 3 年，魏源帮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再是就当时关系京师稳定的大政——漕运问题考求古今、南北奔波，提出了详尽而周密的改革方案。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康乾盛世已成历史的记忆，嘉庆朝的余晖也已荡然无存，道光皇帝虽正值青壮之年，但是，面对危机四伏的烂摊子他似乎振作乏术，一筹莫展。翻阅有关的史书，眼前充斥的是这样一幅情景：各地水旱灾害连绵不断，鸦片输入日盛一日，各种组织的兵变、民变、人民起义此起彼伏，漕运、盐务、河防、货币号称四大时弊。但另一方面，学术界乾嘉考据学风依然强劲不衰，清初惨烈的文字狱之冤使很多文人回想起来仍然不寒而慄，他们虽不满于现实，却只能困守斗室，皓首穷经，做着连他们自己也深表怀疑的考证、补遗的学问。一批进步思想家已不安于书斋清静，而是忍受着内心焦灼的急迫呼吁积极入世，以求参与现实、“经世致用”。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正是在这一时势下应运而生的。这正如他在该书序言部分所讲的：“人积人之谓治，治相嬗成今古”，欲求救治时务的良策，必先知前代典制及处理各种急务的办法。因此，他“鸠聚本朝以来硕公、庞儒、俊士、畸民之言”，编选清初至道光以前的官方文书，私人论述、奏疏、札记等，共 1300 余篇，分成学术、治体、吏治、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 8 纲 63 目，编成了《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共计 120 卷。基于辟除空疏、讲求实用的指导思想，《皇朝经世文编》的编选原则是“切于当代”，益于时务。大凡“古而不宜”，“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筌”读 quán，捕鱼竹器；蹄，捕兔器。筌蹄，比喻达到目的的手段）”，即在历史上虽不失为救世良方，在现实中却不济时务的文论，“皆所勿取矣”；对于那些“务非当急，人难尽通，则天文乐律之属，可略焉勿详也”；而只要是经世之作，不论难易，“无分高下之手”，“或迳言苍议”，“或大册鸿编”，皆选收入编。至于各种观点的论著，魏源采取了“广存并蓄”的态度：“有利必有害，论相反者或适相成；见智亦见仁，道同归者无妨殊辙”。由此可见，这部《皇朝经世文编》是研究清初开国至道光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也

是当时主张改革的进步人士所必读的参考书籍。它的编成，是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最好体现。

《皇朝经世文编》不是一气呵成的。1825年上半年，魏源受贺长龄嘱托开始编辑。同年秋他两次南下上海筹办海运，此后一直把精力集中在漕粮海运问题上，1826年初，他又赴北京参加会试，再次名落孙山。担任这次会试的考官之一刘逢禄对龚自珍、魏源的考卷十分赞赏，极力向当权者推荐，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刘逢禄特为此赋《两生行》表示惋惜，其中称魏源是“无双国士长沙子”。历史上早已惯用的龚魏并称正始于此。考试落选后，魏源返回苏州，又继续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并于当年冬天辑成。在该书序言中，魏源以贺长龄之名申述了自己的哲学、史学思想，论述了事与心、法与人、今与古、物与我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关系，反映出作者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色彩。而这些观点，尤其是它书中贯穿的经世致用思想随着该书的传播很快深入人心。此后“经世文编”几乎成为学术文论的流行体裁，风行海内外。到清末，国内同类的书籍已有10余种之多，而这些饱含着济世渴求的鸿论正好成为日后人们研究清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珍贵资料。

1825年至1827年，魏源除编纂《皇朝经世文编》以外，主要的精力集中于漕运问题上。在这期间，他曾经奔走于南京、苏州、上海之间，协助贺长龄、陶澍（江苏巡抚）等地方官员组织海商试行漕粮海运，并广收资料，极力阐述，宣扬改行海运的必要性、迫切性及重要意义，留下了有关漕运改革的大量著作。

漕粮，是旧时中国历代政府通过水路向京师所供粮食的专称。清承明制，继行长运制，即由官军担任漕粮的全部运输任务。嘉庆年间，洪泽湖泄水过多，致使运河水浅、干涸，河运漕粮受到阻滞。嘉庆皇帝曾令江、浙大员筹行海运，但最后还是被守旧大臣以“谨守前人成法”为由，予以阻挠。从那以后，河运虽然勉强维持下来，但耗资巨大，弊窦丛生，成为百姓的一大重负。史载这是“上既出百余万漕项，下复出百余万帮费。民生日蹙，国计益贫。”1824年，淮河在高堰、山盱等处决口，河道水浅，漕船难行，漕运受到阻梗。眼看着南漕不能北运，京师大量的官、军食用问题难以解决，清政府十分惊慌。第二年，运河漕粮船夫、水手因忍受不了运官、屯丁的压迫勒索，纷纷起来反抗，人数一度达四五万人之多，使清政府更感到难以应付。面对这种形势，有人提出实行海运，道光皇帝下令各有关地方的大小官员就其辖境情况筹议上奏。结果，有一批守旧官员仍然不思改革，奏议阻挡海运的推行。但他们又无法通过河运把漕粮运往京师，最后受到皇帝的严厉惩处。之后，在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的建议下，道光帝下令改行海运，并命令江苏巡抚陶澍、布政使贺长龄筹办进行。

魏源当时是漕粮海运的极力主张者。1824年，贺长龄聘他入幕，正好使他得到了推行自己主张的机会。海运推行以前，魏源曾先后两次到上海出席陶、贺主持召开的由海商参加的筹办海运座谈会，通过详细调查和反复论证，协助他们制定出了海运计划。同时，他还撰写了上下两部《筹漕篇》，并代贺长龄作《复魏制府询海运书》，替松江知府作《道光丙戌海运》。这些文章的主旨在于证明海运势在必行，并劝地方官员当机立断。其中历述各朝漕运成就、详列漕运改革措施的文字更显示了他卓尔不群的良苦用心。魏源的上述所作所为对实行海运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推动作用。海运实行后，他参加编辑了《江苏海运全案》一书。该书共12卷，凡有关这次海运的谕旨、章

奏、案牍及海运的全部细节都尽收入编，是有关海运的最为详尽的清代历史文献。

关于实行海运漕粮，魏源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他说，河流通畅则河运易行，河运阻塞则以海运为便，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当时组织海商运送漕粮，也正是亘古未有的大好时机。他曾说：“三代有贡道，无漕运；汉唐有漕运，无海运；元明海运失，而有官运，无商运。其以海代河，商代官，必待我道光五年乘天时人事至顺而行之。”这可以从三方面得到证明。首先是地利，即清朝国都北京离海近，不像以前各代都设于内地，离海太远。同时，漕粮的主要来源地江、浙两省都是临海省份，不比其他各省远离大海。其次是“事”势，元明两朝的海运都由官方推行，而他所主张的海运则由海商经营。习惯在海上航行的商人对海就像行惯了河流的人对河那样熟悉。第三为“时”势，用他的话说，就是推行海运“道不待访也，舟不更造也，丁不更募，费不别等也”。除此之外，海运还有三利：“曰国计，曰民生，曰海商。”

经过陶澍、贺长龄及属下官员和幕僚魏源等人的精心策划，1846年漕粮正式改由海运。这年2月，第一批商船从上海出发，共运米1122000余石，占全部漕米的三分之二左右。以后继续运送，到6月初即告全部运完，共计装载正米毛谷米共1633000余石，共用沙船、浙江蛋船、三不象船1562只。这次海运的结果，不仅未遭风险，而且时间缩短、经费节省，还避免了各种杂费及中饱、勒索、贿赂等无法计算的虚耗，效果不错。

1846年漕粮海运完毕以后，魏源写了许多文章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了改革建议及以后办理漕运的具体方针。经过海运实践，论意义，原有的三利变成了六便、四利：“国便、民便、商便、河便、漕便”，“利国、利民、利官、利商。”；论经验，有三个环节最重要：“招商雇舟”、“在南兑米”和“在北交米”；至于以后拟行的方案，似以折衷为上：永行海运，辅以河运；江、浙漕粮常行海运，湖广、江西各省漕米以运河运送。

关于漕粮究竟应该河运还是海运的问题，表面看纯属技术上的选择，但是，魏源却从中体察出了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在他看来，这场争论至少告诉人们：任何一项改革，都要“勇变通”、“夷艰险”，只有去掉“人心之积利”，才能“百废可举”。总之，改革过程中，“不难于祛百载之积患，而难于祛人心之积利。”这或许就是魏源愿意在此问题上绞尽脑汁的原因所在吧。

四、“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寄人篱下，虽然可以使自己的抱负更趋近于实现，但同样会因为较多地接触现实而变得心情更加沉重。这种情况下，有人消沉，有人激奋，多数人则会在无奈地认命后依然积蓄能量，静待有所作为的那一天。魏源即属于后者。

1829年，年已36岁的魏源在经过两次会试的折磨之后，违心地出钱捐得了内阁中书舍人的职衔。但这只不过是个空名。从日常的生活内容来说，读书、思考、撰著仍然占据着主要位置。

离开贺长龄以后，作为文人的魏源在对社会的认识上更加深邃、更加敏锐。《默觚》就是反映他这一段时间内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政论集。其中的哲学氛围较以往的著述更为厚重。

默即默深，觚（g 即古代写字用的木板，指简牍），合起来即可译为魏源的读书笔记。其主要思想包括他的认识论、历史观和人才观。

在认识论方面，他坚持行先知后说。他举例说：住在山区的人，了解不到水上行船的危险性；住在水乡的人，你不可能与他谈论翻山越岭的那份艰难与辛苦；善相马者不用按图索骥，善治民者从不拘泥守旧。由此，他十分强调感性认识，并把直接感性的经验看成获取知识的最重要的来源。这些观点与当时居于正统的宋明理学的“知先后”说和“知行合一”说全然背道而驰。

在历史观方面，理学唯心主义坚持历史退化论。它把历史截然分成“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认为夏、商、周三代是“王道”政治的“黄金时代”，而三代以下“教化不行，风俗颓败”，一切都不如三代。魏源针锋相对，认为“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三大端”：一、汉文帝刘恒废除肉刑，说明三代刑法比后世更为残酷；二、秦始皇行郡县，以替代“封建制”即分封制，说明三代私，后世公；三、用人方面，三代“贵以袭贵，贱以袭贱”，后世则取“贡举”之法，任人唯贤。这都表明后世较三代更为进步。从这种进化论的观点出发，魏源认为对古代的东西，“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所变是否合理，则以其是否顺乎民心为标志。他说，租庸调变为两税法，两税变为一条鞭，是“人情所群便”的变革，但如果要舍弃一条鞭法去恢复两税法，舍弃两税法，恢复租庸调制，连三代圣王恐怕也不会去做。而这样的倒行逆施，也会如“反江河水而复归之山”一样困难。如果真有人依着理学家们的退化论史观去做，不俗则必愚。基于进化论的历史观，魏源认为，变古、改革是客观历史发展的“势”所必然。这种“势”迫使社会的一切都必须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也不会以所谓圣王的意志为转移：“虽古之圣王，不能使甲亥之世复还至于无甲兵”，“虽圣王变作，必不舍科举而复选举”，“天下大势所趋，圣王即不变之，封建亦必当自变”。这里，魏源的“势”，指的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进化趋势。

但是，魏源的历史进化论点很不彻底。他认为：“气化无一息不变者，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变”是历史进化的趋势，“变”是世间一切事物的特性，但唯有“道”是例外。他的道就是：“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的“三纲”所维系的封建统治秩序。这种不变的“道”决定了魏源改革思想的局限性，决定了他无法冲破地主阶级思想的藩篱，也决定了他的改革设想以不变革封建制度为其根本原则。魏源的历史进

化观还有个极大的缺陷，就是他沿袭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把历史的进化发展局限于“太古”、“中古”、“末世”的圈子以内，使历史的发展陷入了无限的循环往复之中。

根据上述的历史进化观，魏源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思想。首先，他认为，当时的清朝，已处于三世之“末世”，唯有改革是其正途。其次，他积极倡言改革，认为“有以除弊为兴利者，有以节用为兴利者，有以塞患为兴利者，有以开源为兴利者”，由此四点去思考改革，则会无往而不胜。而关于漕运、盐政、河治的一项项改革方案，也正是在这种考虑之中渐趋完善的。

《默觚》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除上述哲学和社会改革的思想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人才观。魏源认为，人才问题至关国家的盛衰兴亡，“国家之有人材，犹山川之有草木，蔚然羽仪。”正因为魏源认识到人才对于国家政治的无比重要性，才对人才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得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关于选拔人才，他认为：首先要使全国上下能畅所欲言，这样才有利于人才的发现与选用。用他的话说就是：“世昌则言昌，言昌则才愈昌；世幽则言幽，言幽则才愈幽。”其次，国家要重视人才的选拔。偌大的国家，人才不会没有，“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匿”，只要重视发现人才，不怕没有人才，可怕的是不去注意发现。关于用人，他强调，用人必先知人，知人之长，知人之短，知人长中之短，知人短中之长，要真正做到知人，是十分困难的。人才的聪明贤能与否，“上知下易”、“上知下难”，君主对于臣相的了解不如大夫，臣相对大夫的了解不如士，大夫对士的了解不如民。其次，所谓用人，实际上就是“取人之长，避人之短”，这也是用人的本质和关键。在他看来，人的“才”与“能”是有区别的，一般人以能为才，实则大谬不然。“小事不糊涂之谓能，大事不糊涂之谓才。”用人时最忌讳、也最易出现的一个错误是“以言废人”、“以言举人”。这应该尽力避免。

《默觚》显然只是对某些哲学、历史、人才问题的理论探索，而体现这些理论观点的实践则是随后对盐政改革和水利建设的系列思考。

盐政始终是自然经济状态下封建统治的要政之一。而盐政改革的要害也往往集中于官方垄断贩盐还是由商人参与竞争的两难选择之间。统购统销、食盐专卖政策可以保证百姓不因食盐短缺群起闹事，但官商中饱私囊，形成官员贪污腐化现象却难以禁绝。一般商人参与贩盐可以增加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却不能确保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正因如此矛盾，历代封建王朝多数情况下采取盐政垄断的策略，只是在贪污腐化之事臻于极致之时才开放盐禁于一时。魏源是盐禁开放论的倡导者。这不仅源于他那改革的一贯主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曾有过一段亲身参与贩盐的经历。1835年前后，家父病逝，魏源因缺少治家经验，“以致连年负累几乎身家荡尽”。大约从1836年开始，魏源与人合作，从事贩盐。当时，淮北票盐法已经施行了好几年，买票贩盐营利已大不如前。据魏源所述，当时运盐销盐利息不足3分，即大约30%。虽然如此，由于他“流落江淮，无可谋生”，不得不“就近经营，以为免死之计，非择其利厚而为之”。尽管看起来魏源对经营贩盐的营利不十分乐观，但他还是承认“卜地既成，而宿负亦偿”。他在扬州的居宅“洁园”便是他经营票盐获利以后所建。通过经营票盐，魏源也提出一些经商之道。他曾颇有感触地回顾几年来奔波逐利的辛酸，认为：“谋生一事，视乎人之命运，人弃我取，固不必舍近而求远，舍逸而就劳也。”

水利建设也始终是魏源关注的焦点之一。早在 1814 年，第一次随父进京途中，魏源就对沿途黄河决口，淹没民田、民宅的凄惨情景深有感触。他曾以梦寄情，殷切希望能尽快解决水利问题，写下了“旅客有奇梦，梦游古华胥，手持水利书，副以沟洫图，拜献神禹前，冀免斯民鱼”的诗句。1819 年，永定河发生水灾，两县被淹，同时，黄河在三处决口，造成村庄、沃田没入水中，老百姓生活陷入绝境。1824 年，淮河在高堰决口，致使漕运梗阻，京师一片恐慌。1829 年，湖北和江淮地区大水成灾，良田尽废。短短十几年间，大灾隔三见五，小灾连年，河患成为清政府所面临的一大困厄和弊政。1830 年到 1842 年之间，魏源先后写下了《湖北堤防议》、《湖广水利论》、《筹河篇》上、中、下等几篇专门研究水利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涉及黄河、淮河、长江、汉江等大小河流的治理和防患，从历史到现状，从水灾发生的原因到治理水灾的办法措施等分析深入，研究细微，见解独到。但是，尽管如此，魏源的有关建议却无一被付诸实施，这是极令后人抱憾和扼腕的。

总之，在由“经世致用”到后来奠定魏源思想家地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间，系统的理论思考和对漕运、盐政、河防三大弊政的改革建议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五、鸦片战争期间

1839年5月的一天，魏源在扬州的家宅“洁园”中接待了久违的老友龚自珍。他们先是绕园一周，魏源不无兴奋地讲述着近几年来他如何经营票盐、如何失败、后来又如何大获利润的经历。龚自珍惊讶的是，眼前这位谦谦儒子居然有这般能耐，用自己赚取的银两修起这算不得豪华却也舒适的宅子。说着说着，话题不由自主地转到了他们共同关心的时事、政局上面。

龚自珍这次是因为受不了礼部中那种扼杀人性的倾压与无聊而辞官南归的，自然少不了愤怒与感慨的悲壮。而魏源也有感于满腹经纶却无处挥洒，长嘘短叹。他们谈话的气氛当然轻松不了。

然而最使他们忧心的还是鸦片泛滥所已经和可能带来的种种危害和严重后果。

魏源慷慨激昂，指斥眼下白银外流、漕运败坏、盐政日弊、水利失修，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于鸦片烟毒得不到及时查禁而导致的。他还担心地对老友说，如果朝廷不尽快设方禁绝鸦片，特别是从朝廷的上层官员开始戒瘾禁烟，边境的危机将为时不远。

其实，就在魏源作如此预测的同时，英国资本家已经下定了通过战争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决心。

几个月以后，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出兵中国。

然而，战争的爆发虽为魏源所不愿看到，却也为他提供了为国效力的机会。

1840年8月，接到友人黄冕的请求，他来到浙江宁波的钦差大臣伊里布军营中参与审讯英军俘虏、炮兵上尉安突德。审讯中，他边审问边作记录，详细笔录了该罪犯的供词。后来，就是根据这些供词，又采集参考其他资料，写成了《英吉利小记》。这便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英国情况的文章。

这次审讯，使魏源对中国人的闭塞深有感触，也使他对英国侵略者的本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他写道：英国的商船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发现防卫不严的国家，就赶紧请来本国的军队对其以兵压境。破其围城后，或者使其成为自己的属国，或者将其瓜分为几个小国。据说美洲和非洲的很多国家就是被它这样占领的。

说到鸦片，他经过考证指出：英国本国并不出产鸦片，也没有人吸食鸦片，但是，英国却因为向国外大卖鸦片而大获其利。它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靠的就是鸦片贩卖。

他还以大量事实揭露和批判了朝廷中投降派那种“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的谬论。

1841年2月，魏源经林则徐介绍来到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的幕府，协助其抗击英国侵略军。在防守定海的战役中，在建城问题上，魏源主张“前勿包埠，左右勿倚山，但环旧城，再筑外郭（古代城圈以外的城墙）”，这样可以避免分散兵力，便于集中力量守住定海。当时，定海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但左右两面并未靠山，城外二三里地方还有一条道头街约一里多长，定海三总兵却主张修筑外城时，把道头街也包括在内，左右两面则以山为城。魏源与他们主张的差异就在于筑外城时不要包括道头街，左右两面也不要靠山，这样只留一面以山为城，防守时兵力集中，“城足卫兵，兵足守城”，可以万无一失。但是魏源的主张没有被采纳。实际上，魏源的建议也不见得

十分正确。后来定海失陷，魏源认为是英军“乘我守疲”时登山入城，是带有偏见的。定海防务的建议未被采纳，魏源感到十分委屈，情绪一落千丈。正如他所说：“到此便筹归，应知与愿违。”之后，英国从舟山撤军，老友黄冕奉命前往善后时，邀魏源一同前往。在那里，魏源看到英军狡猾无信，清军虚骄自大，朝廷则战和不定，对前线抗敌彻底地失去了信心。不久以后，他便怀着十分愤闷的心情离开了浙江。

1841年7月，林则徐被琦善为首的投降派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从广东遣戍新疆伊犁，途经京口（今镇江）时，与魏源不期而遇。旧友重逢，又同是天涯沦落，追昔抚今，不禁百感交集。在长江岸边，他们举杯共饮，对榻长谈，尽情地抒发着内心的积郁和悲愤，通宵达旦。临行前，林则徐将自己组织人力收辑、编译的介绍西方国家地理风土的《四洲志》及派人偷摹的洋船洋炮图交给了魏源，希望他在其基础上加以扩编。魏源欣然接受。之后的一年内，魏源辛勤劳苦，日夜编撰，终于在1842年底完成了《海国图志》50卷的编纂工作。那部书便是以《四洲志》为蓝本的。当然，这是后话。

再说林则徐在京口小驻后，又匆匆启程。魏源依依不舍，特赠诗两首，以作纪念。其中一首中的“方术三年艾，河山西戒图”，是林则徐、魏源两个爱国士大夫的共同心声，表达了他们对西北沙俄威胁的忧虑。

鸦片战争期间，魏源满怀爱国激情，希望在前线的抗敌斗争中有所建树。但是清朝军队腐败不堪，帅命非人，将不知战，使他非常失望，激情难胜，又不得用武之地，不能操枪就只好拿笔，继续议论时政，针贬时弊，谋图对前线抗英战事有所裨益。从1840年到1842年间，他先后写成《寰海》10章，《寰海后》10章，《秋兴》11首，《秋兴后》13首，《筹河篇》上中下3篇及著名的信史、绝作《道光洋艘征抚记》、《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并与他人合作编著了《淮北票盐志略》、《定庵文录》、《定庵外集》等书，合计不下百余万字。这些著作或慷慨陈辞，评判时事，或痛心疾首，总结教训，或满怀热情，想方设法，其中洋溢着作者无限的爱国激情，体现了魏源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

《寰海》和《秋兴》诗包含着魏源在鸦片战争期间的爱憎之情，蕴藏着他的许多感爱。诗中多处痛骂琦善等投降派误国误民，为林则徐遭受不白之冤大鸣不平；痛斥清政府不辨黑白，滥惩无辜，指斥它在战争中战和不定“争战争和”、“忽盟忽叛”、“浪攻浪款”，根本没有全盘计划。在敌人火炮威胁下被迫缔结城下之盟以后，清政府仍然不知重振精神、革故鼎新，借着结盟的机会加强边防，以图亡羊补牢，却粉饰太平，把纸上条文当成“万年和约”，把暂时的停战看做永久的“承平”。他强烈呼吁清政府选好外交人才，“师夷技收夷用”，“借款盟修塞备”，以图再战。

三元里抗英的胜利，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光辉一页。在这些诗中，魏源热情歌颂了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反映了魏源对人民武装抗英力量的高度重视。诗中写道：“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通夷”。

魏源歌颂人民、歌颂为抗击英国侵略军立过功劳的一切英雄。主战派大臣王鼎因反对投降派头子穆彰阿愤而自杀，魏源对此表示了无比的愤慨和同情。他专门作诗赞扬王鼎不惜尸谏的爱国之情，并痛斥琦善等人陷害忠良，投降卖国的恶劣行径。他这样写道：“屡闻闽海获余皇，大有蛾眉妬雁行。

三级首功收魏尚，九边矫诏罪陈汤。若从露布衡虚实，试较要贤孰短长。寇拜海中恭顺奏，炮安阜顶协和章。”

当然，魏源在鸦片战争中所写的著作，以《海国图志》、《圣武记》影响最大。由于《海国图志》在以后的10年中还曾不断扩充，直到1853年才最后定稿。这里先说《圣武记》。

《圣武记》成书于《南京条约》签订的当月，长约40万字。这部书，按作者的说法，是在他“晚侨江、淮，海警飏忽，军问沓至，忤然触其中所积”的时候，“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论议若干篇”写成的。当时，清朝统治集团丧权辱国，误国病民，魏源为激励人心，发愤图强，著成此书。其目的是“师前圣前王”，“补过于来时”。所以，在《圣武记》中，魏源历述清初武功，详细而全面地描绘了鸦片战争的图景，并提出了亡羊补牢的希望和具体方法。这是一部具有鲜明爱国主义思想的信史，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书中关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总结了三点教训：（1）将命非人，贻误战机；（2）战和不定，防守失当；（3）战略战术上错误迭出。关于清朝政府最迫切的时务列举了四点：（1）严禁鸦片；（2）疏散在京的八旗子弟，使他们自食其力；（3）“缓本急标”，即重视农业的同时，发展工商业；（4）改革币制，遏制白银外流之势。凭心而论，这些观点未见得非常准确，但其中浸淫、充斥的作者那忧国忧民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却时时地令人感慨、令人激奋。

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魏源始则置身于前线，继则潜身于书案，无论是动是静，总是在爱国主义意念的引导之下努力地奋进着。

六、“师夷长技以制夷”

农历 1842 年年底，新春的景象已经笼罩了苏北的扬州城。家家户户进进出出，已在忙碌着备年货、穿新衣了。魏源划上了《海国图志》的最后一个句号，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终于赶在年关之前完成了这部长篇巨著。

1842 年是魏源一生中很有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他写成了 40 多万字的《圣武记》，又编选了长达 50 卷的《海国图志》。到此为止，面对积贫积弱的清王朝，魏源坚信自己找到了拯救国家的最佳途径——“师夷长技”，鼓吹武功。

不过，此时此刻，他仍在担心自己的“师夷”主张能否被人们所接受。回想当初编选此书的动机，正是受到战争初期英军已攻入家门而我们还在询问英国在什么地方的闭塞无知的触动。但那种感觉当时不就自己才有吗？别的官员对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曾认为多余吗？后来林则徐注意掌握“夷情”却被谪伊犁，自己所做的事情正是了却了林兄的长久的夙愿，这种背景下的这种主张是不是太过大胆、且有点不合时宜呢？

然而，魏源毕竟是魏源。近 20 年的幕僚生涯使他早已习惯了为人轻视、被人蔑视的那些情景。作为一介文人，如果连鼓吹、呼吁的勇气都没有了，又怎么去挽救时弊、效尽匹夫之志呢？想到这里，他暗示自己不用过虑，是真知必然会为人接受。他坚信自己没有错。

的确，魏源的主张是有些超越时代、石破天惊的味道。对此，他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正因为估计到了“师夷”一说可能遭遇的种种阻力，当他在《海国图志·叙》中开宗明义阐明其全书的宗旨“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时，就反复强调了“平人心之积患”的极端重要性。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魏源这一划时代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一比较详尽的介绍。

《海国图志》实际上是一部围绕“师夷”、“制夷”编选的时事文集。按照魏源开列的“制夷”方策，其第一步是从变革观念开始的。

魏源说，人心之积患是无形的东西，非水、非火、非刀、非金、非沿海之奸民，也非吸烟贩烟的莠民，而是存于人们心底的根深蒂固的“虚”与“寐”。所谓虚、寐，就是人为地粉饰、骄狂，不求务实但求称功的虚伪、愚昧的思想意识。去寐祛虚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愤”与“忧”。“愤”即愤怒、发奋图强，与麻木不仁正好相反，“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忧”即忧虚、忧国忧民，与盲目乐观相反，“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海国图志》编选的首要目的就是使读者忧虑国事，“师夷长技”，以达到“制夷”的最终目的。

《海国图志》最初完成时，只有 50 卷，1846 年魏源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将其增补成 60 卷本。1852 年他又作了较大幅度的改动，大大扩充了原文，达到 100 卷，使这本书更具实际意义。

《海国图志》全书编选的主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它所收入的文章也从不同角度回答了在当时情况下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问题。这里重点就“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内容加以介绍。

1842 年成书的 50 卷《叙》中提到“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该口号第一次完整的表达。但它的形成则早在它的准确表述之前。

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秦汉时代，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也远在明代初期。但是，中国人真正地注意西方则是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其标志便是林则徐的那段名言，即对于鸦片流毒天下“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所引起的中国统治阶级对西方“藩邦夷族”的普遍重视。19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中国思想界的一批进步思想家，如龚自珍、魏源等人，提倡经世致用，在注意和研究边疆史地、正视外敌入侵现实的同时，发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诸如：英俄等国为什么要侵略中国？它们又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等等。在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中，他们发现了“夷”国坚船利炮的长技和长于对外贸易的特点。但在战争之后，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大清帝国有向这些国家学习的必要。战争期间，林则徐首先提出了自造船炮以“防夷”、“制夷”的问题，并付诸于行动。但那时的魏源，在认识上较林则徐要迟钝得多。比如，在《圣武记》中，他就曾公开主张过“造炮不如购炮，造舟不如购舟”。鸦片战争后期及以后，魏源通过编辑《海国图志》，对西方殖民主义靠掠夺致富的本质和资本主义民主政体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师夷”、“制夷”的主张也逐渐地得到了完善。可见，“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是魏源在继承林则徐学习西方的思想并吸收同时代人的“师夷”、“制夷”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当时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的代表性口号。魏源是这种思潮的集大成者。

“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代表性口号和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着十分丰富的具体内涵。首先，它包含着这样三个基本的问题：一是“夷”之长技有哪些？二是如何“师夷”，即如何变“夷”之长技为我之长技？三是所谓“制夷”，怎样才算达到了“制夷”？

“师夷”、“制夷”，必先“悉夷”。这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首要观点。他严厉抨击了清朝统治集团昏庸无知、冥顽不化的顽固态度，嘲笑这些人“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并感慨英国在新加坡建英华书院，教汉语文学，刊中国书籍，“洞察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知其背景。为此，他呼吁：“欲制夷患，必筹夷情”，“驭边在先悉夷情”，把了解敌情放在了一切事情的首位。他深刻阐述了“悉夷”与不“悉夷”的利害关系，指出：“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的指导下，魏源积极研究了“夷”之长技，提出了“师夷”、“制夷”的种种策略。

何为“夷”之长技？魏源曾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但他并不认为“夷”之长技仅此而已。除了这些军事方面的长技以外。“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浮巧。”比如民用轮船，用它通文报，则长江大河，千里之遥，昼夜即达，可省邮递之烦；用以办事，无论朝见皇上还是南下闽粤，十天半月便可完事；以助战舰，则可以牵引受损的战船，避免触礁的危险。像这样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先进器械还有很多，他举出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等，然后加以概括总结，认为“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奇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也就是说，凡借助自然力量，经过一番研究，能使其得到科学利用的新工艺、新技术都可称为长技。这样，可师之长技绝不只限于军事方面。

除了对军事力量强盛看技术进步等的赞赏以外，魏源对美国 and 瑞士等国

的联邦制和议会制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也极为倾慕。他曾高度赞扬美国的近代资产阶级联邦制度，称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并认为美国的联邦制有“武”、“智”、“公”、“周”四大优点。他是这样解释的：美国几十年中赶走英国，尽复国土，而且不断地向西扩张，能不说它“武”吗？美国在从英国手中取得解放的过程中，巧妙地借助了法国的帮助，远交近攻，能不说它“智”吗？在建立政权时，一变古往今来官民隔阂，人心皆向，能不说它“公”吗？议事时，广听博引，选官时唯才是举，一级级自下而上，众人说行则行，众人否定则否，众人喜欢则从，众人厌恶则弃，总是少数服从多数，能不说它“周”吗？魏源还用大量篇幅详细介绍了美国的总统设置和学位、议员的选举办法。在谈及瑞士的议会制时，他介绍说：瑞士不设帝王，以数名贵族共同办理国事，基层则公推乡官，并无封赐，其国内秩序井然，真称得上是“西土之桃花源。”这些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的确比清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要进步得多，优越得多，但是魏源看到的却只是些表面的、非本质的东西。尽管如此，魏源也只是羡慕而已，他并不主张去学习。因此，魏源的思想仍然未能超出地主阶级思想的藩篱。总之，相对于所处时代和当时满朝文武愚昧自大的状况来说，魏源能看到外国侵略者的上述长处已是很难能可贵的了。

“悉夷”的目的在于使其长技引为我用。那么，如何“师夷”呢？

魏源说：“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旄（máo 古时使臣外出时携带的象征授权的杆旗，因杆头用牦牛尾装饰而得名）。”要“师夷长技”，要想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利用西方的先进器械，就必须了解西方的现状；而要了解西方的现状，第一件要紧的事便是选拔人才。他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时说：“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在用途众多的人才之中，外交人才担负着重要的责任，能者可能学到外国的长处，完成御侮的任务，庸者则可能不仅收集不到外国先进的资料，而且只会误国卖国。魏源把选拔外交干才看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首要条件是很有见地的。

至于“师夷”的具体步骤和办法，有以下几点：

一、设厂雇洋匠，传授工艺制造和使用技术。他说，英国的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则十分平常，我们真要去学，并不困难。据此，他建议在广东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二处设置造船厂和火器局。师傅从法、美两国聘请，工匠从福建、广东的能工巧匠中选拔。这样，不出数年，西洋的造船、修船、驾驶，造炮技术就可以尽为我用。我们也不必事事仰赖于洋人。

二、购买洋炮洋船，以备学习。鸦片战争期间，魏源就有过“造炮不如购炮，造舟不如购舟”的主张。在《海国图志》中，他虽然不再反对造船造炮，但仍把购买船炮看成设厂雇洋匠的补充。他说：通过洋师傅学得奇技以后，“则知工料之值，工食之值，每艘每炮有定价，然后可以购买”。因此，他主张凡外国人有愿意把船炮卖给我们以抵销关税的，应尊从其便；闽、粤商人去南洋贸易，有愿意购买船炮转卖官方的，也应予以鼓励。

三、建议政府增设考试科目以培养技术人才。他说：“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上之所轻，下莫问焉。”只要统治者重视，在闽、粤二省武试中增设水师一科，给予会造西洋战舰、火轮船、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凡能驾驶舰船于飓风浪涛之中，能熟悉风云变幻和海路情状，能使用枪炮百发百中者，均赐给行伍出身；凡水师将官，必须出身于船厂、火器局，否则要由舵工、水工、炮手拾级晋升。科举考试的命题是引导知识分子

学习的指挥棒。只要项目设置合理，对于迅速造成全社会的“师夷”之风定会非常得力。

四、师西洋选兵练兵办法，淘汰粤省水师中的虚伍冗员。魏源认为，组织一支精干的军队，重要的是选兵，而选兵制必先对其“贍之厚”。“贍之厚，故选之精；练之勤，故御之整。”为此，他提出“每出兵，以银二十圆安其家，上卒月饷银十圆，下卒月饷银六圆。”对于厚养军队，一般人一旦提及，马上以经费短缺为由进行非难。而魏源认为：“兵饷无可议加，惟有裁并之而已。粤省水师将及四万，去虚伍计之，不及三万，汰其冗滥，补其精锐，以万五千人为率。即以三万有余之粮，养万五千之卒，则粮不加而足。”

五、提倡官办民用工业和商办工业。魏源提出自设军事工业的建议以后，有人即驳难说：军队所需要的武器及战舰等毕竟有限，按西方各国的速度，只需一二年便可生产出足够军需的武器，之后，这些工厂不是就没事可干了吗？对此，魏源回答说：船厂不只是制造战舰，战舰造成后，则可以为闽、广商人大造商船，他绝不相信经常出海贸易的商人对技术先进的商船会没有兴趣。此其一。第二，除生产商用船艘外，“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等，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这里，魏源最早提出了先发展军事工业，然后再发展官办民用工业的“师夷”步骤。在官办民用工业发展起来之后，魏源认为可考虑“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魏源的这一建议是十分大胆的。在清王朝统治之下，私养兵的亦属非法，何况私铸兵器，更要遭杀身之祸。而魏源却主张商民自行设厂制造枪械，这是对封建统治的大胆挑战。

六、开译馆，译外情，以加强边疆防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魏源曾经写诗道：“题本如山译图书，何不别开海夷译馆筹边漠？夷情夷技得夷图，万里指掌未沙如。”开译馆不仅是为清朝贵族处理国家政事解决满汉文字对译之困难，更重要的是了解“夷情夷技及夷图”。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专门从事外国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普及工作，对于“师夷长技”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七、变革过去陈腐的观念和制度。魏源知道，西方各国以获利为根本。在西方，商业远比农业居更重要的地位。因此，他要求改变过去“重本抑末”的观念，提出了“缓本急标”的主张。他认为，当时的时代已是商业重于农业的时候了，人的观念自然也应该随之改变。

从以上“师夷”的论述看，魏源已经达到了当时情况下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更为可贵的是他从理论上提出了“师夷”的具体步骤：先有官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然后再有商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这样，中国的民族工业就建立起来了。后来的洋务运动大致的步骤就是这样。由此可见，魏源是洋务派思想的先驱，启迪了洋务运动的到来。

“悉夷”、“师夷”，最终目的在于“制夷”。了解“夷”之长技，学到了别人的先进技术，并不能算已“使敌失其所长”。那么，怎样才算完成了“制夷”的任务呢？

魏源在提到“制夷”时，也常常提到“攻夷”和“款夷”。“攻夷”即在战场上与外敌进行直接的军事斗争。这种斗争可以是我正规军队与敌军作战，也可以是我方通过外交手段使别国与我之敌军作战，也可以是我之不法莠民与敌军作战，即以我攻外敌，“以外敌攻外敌”，“以汉奸攻逆敌”。此三者都属于“攻夷”，共同点是皆为直接的军事冲突。“款夷”指以和平

的外交手段在敌国之间制造矛盾，然后再利用这些矛盾，团结其他的国家来共同对付主要的敌人。其中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通过给予另一个国家某些利益，吸引敌国向我屈服；二是团结其他国家使其向敌国施加压力，迫使敌国屈服于我。“款夷”的特点是利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而不是采取战争手段，但并不排斥以武力为后盾。所谓“制夷”，其标准是“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他曾说：“制夷者，必使敌失其所长”，“制夷”就是“驭外夷”，使敌人为我所用。可见，魏源的“制夷”绝不是只求一战一役的胜利，而是要在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科技、富国强兵的前提下，使敌人永远在心里屈服于我。

“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了面向世界，学习西方的救国救民途径，首开了中国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端倪，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从而，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界。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也无不以魏源为其先师。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后追忆自己的洋务思路时就曾这样写道：“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至于后来左宗棠收复边疆的历史贡献，也是对林、魏早年防俄、抗俄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卓越继承。此外，王韬盛赞“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欲以一生精力，辑成《海国图志》一书，以备国史四裔志之采录”。康有为推崇《海国图志》为“讲西学之基矣”。梁启超认为，如果要追溯 19 世纪新思想的起源，则不得不从龚、魏说起。

其实，“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在日本的影响比在国内还要大。大约在 1851 年左右，此书传入日本，各种译文达 20 余种，各学馆纷纷以此书作为世界史地的教科书。当时日本的学者有的称它“实武备大典”，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最为有用”、“非他书可比”。日本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佐久间象山等都研读过《海国图志》，梁启超在追寻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根源时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的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人，“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地演出了倒幕维新的现代剧。

七、一生治学，十年为官

1844年新年刚过，魏源端坐在他南京寓所的书案前，看着桌子上摆放的厚厚一叠《海国图志》和旁边散落的10多封友人来信，心中一种安慰、满足、惬意的暖流一阵阵传遍全身。他微微闭上眼睛，连日来各方面对《海国图志》的赞美、崇尚使他越想越激动。他开始相信几十年伏案、奔波、苦思冥想的辛劳没有白费，这部书所反映的观点也的确使他成了中国社会思潮的弄潮儿。想着想着，不觉有些飘飘然了。

忽然，他猛地睁开眼睛，离坐起身，声音轻弱而又坚定地告诫自己：“不！现在还不是得意的時候。眼下的任务是集中精力，准备会考。”

去岁以来，当他数着自己的年岁踏进50的门槛时，生出了一种人生苦短、不能再磋跎岁月的紧迫感。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心最后再拼搏一次，成则入世，败则隐居。他知道：一生求学，目的不就是入仕为官吗？半生的压抑和寄人篱下使自己的心灵早已扭曲。绝不能就这样认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想到这里，他重新回到桌前，移开了《海国图志》和各方来信，又搬出了自己早已耳熟能详的四书五经，开始了枯燥乏味的应考准备。

转眼间冬去春来，会试的日期逼近了。他收拾行装，踏上了又一次北上的征程。这一次，虽说有一种莫名的悲壮萦绕着他，但他还是感到比较轻松，似乎有种力量在冥冥之中告知他：轻松些，这次你一定成功！

果然不出所料，发榜的那一天，透过重重人围，魏源终于在三甲49名的位置上找到了他的名字。他当然感到兴奋，看来这生不枉矣。然而，正在他焦急地等待着殿试通知时，却等来了罚停殿试1年的通告，理由是涂改试卷。

以后的日子度日如年，一天天地算一天天地捱，当最终熬过1年、重行殿试，并以三甲第93名被赐予同进士出身的时候，他的兴奋之情早已荡然无存。

1845年7月，朝廷分发魏源到江苏扬州府东台县任知县。分发令一到，他急赴任所，于一个月后正式上任。

到任之时，正逢夏粮征收的时分。魏源下令开仓征粮。命令已出，他又开始盘旋以后的工作应该怎么去做。可是，正在他熟悉县情、布划未来的时候，吏卒来报，有人击鼓喧哗，阻止征粮。怎么办？吏卒焦急异常，并告知魏源他的前任葛起源就是因为处理抗粮事件不当而被迫下台的，还劝告他一定要慎重从事，最好先暂缓征粮，安抚闹事人，等以后从长计议，魏源不动声色，问明闹事人数和基本情况后，告知吏卒照旧开仓征收，对闹事者不予理会，但要随时秉报闹事者的动静。

时辰不大，吏卒再次来报，先前闹事的人都已到齐，声势很大，如不尽快宽慰，仓中粮食也难免被抢。魏源静思片刻，下令集中巡捕和所有县吏，将闹事者尽数抓捕，一个也不放过。

魏源的举动震慑了所有的抗粮群众。少数闹事人被投入狱中后，原来观望、等待的老百姓见无计可施，便很快交上了漕粮。一场哗变就这样平息了。然而，正在县民们战战兢兢地候望着新任县令对闹事百姓的处理结果时，魏源却宣布释放所有被抓者，而且既往不咎。一时全县上下奔走相告，人们相劝乐业，庆幸遇上了爱民如子的好官。

由于魏源在上任后的第一次亮相中就博得了人们的好感，此后的政事推

行起来也十分容易。他收藏书籍、改建书院、整顿育婴堂、收埋无主尸骨，还救济孤寡老幼，为百姓传种牛痘，“一切善政，不可枚举”。

但是，就在魏源在县令职位上应付自如，并雄心勃勃地济世救民时，他的母亲病逝了。魏源无限伤感，但又深感自己官运不佳。几十年苦读，一朝得官，刚干了一年，又碰上了回籍守孝的严酷现实。他依依不舍地回到了扬州家中，又无奈地过起了读书、写作的日子。

很快，3年“守制”悠忽即逝，魏源又回到了不曾熟悉的官场。不过，这次复官，他已不可能再回到东台原任，只是被命去催促漕粮空船南还之事，附带地监督疏浚河道。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什么官职，只不过是替官方做事而已。

经过大约1年的等候，1849年7月，魏源被正式任命为扬州府兴化县知县。

兴化县地处低洼，地势犹如一口敞开的大锅。在兴化做知县，大量的政事实际上是治河治水，不是兴修水利，就是防灾抗灾。而这，也许正暗合了魏源早年对兴修水利的关心。工作起来，或许会更加得心应手。

兴化县附近有高（邮）宝（应）、洪泽两湖。两个湖泊每到秋季，几乎必有水汛。而正是这一年一度的水汛，竟成了当地老百姓最大的灾难，也是历任兴化县吏绞尽脑汁却始终了无良方的大难题。因为每年秋汛发生之时，正是早稻成熟的季节。如果此时为防止湖水泛滥而开坝放水，兴化农民的早稻必定会颗粒无收；若能坚持到秋收以后，则保护了农民利益。魏源到任时，堤坝年久失修。当地官员每到秋汛，怕决堤被罪，一见湖水上涨，就启坝放水。结果，堤坝保住了，但兴化等县已熟的稻谷则常常被湖水淹没尽净，造成河区7个州县饥荒连年，其中以兴化县最为严重。魏源到任前一年，就因堤坝过早泄水，致使扬州等府发生重大饥荒，最后从四川、广东等省大量运来稻米，才不至于饿殍遍野。魏源到任时，正赶上河水初涨，当时其他官员正纷纷议论准备启坝放水，百姓十分恐慌，丰收在望的粮食即将化为乌有。魏源得知此情，“闻风驰赴”，一面反对河道官员过早启坝放水，一面亲自督民夫抢修、加固堤坝，昼夜筑护。为了战胜河道官员启坝之主张，保护粮食，他又请示上司，得到巡抚陆建瀛大力支持，使河道官员不敢坚持己见。

就在魏源与陆建瀛一起督导塞防的时候，西北风大起，狂风暴雨呼啸翻滚达两昼夜，河堤眼看将要被洪水吞噬，高邮一带危在旦夕。魏源“冒风雨，伏堤上哀号，愿以身贷民命”，在魏源带动下，百姓十余万人加入到防洪修堤的战斗，经过几个昼夜的苦战，终于风平浪静了。再看魏源，两眼肿如蟠桃，所见者无不为之感动。这年，兴化早稻大获丰收，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魏公稻”。东堤加固以后，魏源又亲自勘察了年久失修的运河西堤，并进行重修加固。西堤修缮，魏源规定：每年湖水大涨时，不得提前启坝放水，必须在处暑以后，等稻谷已收，才能开坝放水，还立碑刻规，以示警戒，其功绩在兴化县内几代相传。

1850年，江苏巡抚陆建瀛决定在淮南地区改行票盐，并下令设总局于扬州。当时淮南盐政十分腐败，弊端丛丛，已臻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对于改行票盐，魏源主张，淮南课额很重，地域辽阔，骤然全面改革，可能会产生鞭长莫及的弊端，因此，他提出从改变上游销售点逐渐推广，这样，就可以举重若轻，运筹帷幄。而陆建瀛十分急躁“竟奏全改”，致使问题成堆。就在这全改的办法难以实施之际。陆又将治理盐政的难题交给了魏源，任命他为

淮北海州分司运判。到任之后，魏源一面根据实际情况，推出降低盐价、减征钱粮等改革举措；一面亲自监督各盐场努力生产，杜绝偷漏，查出私盐 30 多万担。淮北盐产的增加为填补淮南积欠提供了雄厚的基础，淮南多年欠产很快被填平了。

鉴于在兴化知县任内政绩突出，不到一年，魏源又升任高邮知州。正当他鼓足干劲，准备大干一场时，由于在兴化知县任上积劳成疾，加之年事已高，无情的黄疸病击倒了他。那段时间，他全身皮肤蜡黄，痰多气短，饮食十分艰难，身体虚弱之极。后来虽病体痊愈，但元气大伤，对官场政事已不胜其烦。尽管如此，在高邮，魏源还是为清政府效尽了犬马之劳。这就是残酷镇压了境内响应太平天国革命的农民斗争。

1851 年 1 月 11 日，洪秀全率拜上帝会众人在广西金田村揭竿而起，之后又以势如破竹之势所向披靡，直抵南京。1853 年 3 月 19 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城，建南京为都，并改号天京，接着，为保卫天京，太平军继续北上，连克仪征、扬州等地，扬州的漕运总督、两淮盐运使纷纷逃到高邮。不久，太平军前哨又到达距高邮 40 里的邵伯镇。高邮知州魏源面对以推翻封建统治为目标的农民革命，像一切地主阶级成员一样，毫不犹豫地作出了相应抉择：以对抗乃至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为己任，侧身于镇压太平天国的行列。他甚至认为，这是历史给予他的最好的表现机会。

在太平军从湖南永州向江苏扬州进发时，高邮一带已经出现了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溃军。这些溃军沿途所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高邮城中“一日十数惊”。魏源为了保境安民，在高邮城外率吏卒擒斩百余人，使得逃兵不敢入境。魏源的行动不仅暂时地阻止了溃兵入境，而且从此以后，官兵前线受挫进入高邮境内，“屏息潜踪，邮民无尺寸失者”。太平军即将克服扬州时，高邮举人戴煦和其弟戴熙曾请求创办团练，设总局于三元宫。扬州失守后，魏源立即“札谕煦等督率铺局，昼夜巡防，严辑流匪”。当太平军前哨抵达邵伯镇时，魏源更是加紧大办团练，亲自督察巡防，增设关卡、驿站，派人刺探军情，对士兵赏罚严明，对“内奸”严刑峻法，“旬日之间，诸务毕举”。在积极准备对付太平天国的同时，魏源还残酷地镇压了境内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农民。据史载，高邮境内的太平庄，向来是老百姓聚众抗官的场所。太平军到来之时，那里的群众又竖起大旗，准备响应，魏源闻知后，立即率兵前往，抓捕了为首的 20 余人，并于次日凌晨斩首示众。由于魏源的血腥镇压，封建文人誉他是当地百姓的“慑为神”，他所治理的高邮境内也一片太平。

1853 年 4 月，魏源被当时督办江北军务的杨以增以“贻误文报”、“玩视军务”罪名奏劾查办，咸丰皇帝立即下令“魏源著即革职，以示惩戒”。关于被弹劾的原因，有记载说是因为魏源在初任兴化知县时，反对过当时已为江南河道总督的杨以增启坝放水的主张，因而杨与魏源“素有隙”，而借故奏劾以泄宿怨。这种记载是否正确，因资料所限，无从查考。但魏源是否确曾“迟误驿报”，也不能肯定。

魏源被革职以后，到达皖北。那时，原安徽巡抚、时以兵部侍郎充任钦差大臣周天爵正在督师皖北镇压捻军。于是，魏源又应周天爵之邀以随营知县身份充任首席幕府，参与筹划军务。在周天爵幕下，魏源出谋献策，用力不小。1853 年 10 月，周天爵病故，副都御史袁甲三接任其职，魏源随即离去，回兴化居住。翌年在袁甲三奏请下，咸丰帝以策办安徽颍州捻军有功，

对魏源官复原职。但此时此刻，魏源已年愈花甲。他遂以“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仕宦”为由请求辞归故里，至此，魏源短暂而又坎坷的宦宦生涯结束了。

魏源近十年的宦海沉浮，有幸运得志的时候，但更多的是抑郁寡欢。他做官则为民，勤勤恳恳；退官则为僚，一心一意。虽然他对封建统治不满，也曾大胆抨击过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但他还是认为清朝是可以救治的，因而做州县官员时，他为国泰民安而奔波；对付农民起义时，则又不遗余力。因此，他虽然领时代风骚，居时潮之巅峰，最后还是摆脱不了封建士大夫的反动立场。

